

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姚开建 贾根良

调节学派 理论研究

陈叶盛 著

On Regulation Theor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具有博士学位教师资助计划”资助

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姚开建 贾根良

调节学派 理论研究

陈叶盛 著

On Regulation Theor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调节学派理论研究/陈叶盛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5
(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姚开建, 贾根良主编)
ISBN 978-7-300-15563-0

I. ①调… II. ①陈… III. ①经济思想史—世界 IV. 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0844 号

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姚开建 贾根良

调节学派理论研究

陈叶盛 著

Tiaojie Xuepai Lilun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2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5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与 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代总序)

贾根良 姚开建

在我们看来，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与经济学其他学科相比，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忽视，作为最需要财力支持的学科却得到了最少甚至没有得到资助，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人才流失也异常严重，一些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几乎陷入停顿状态，目前该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

如何振兴经济思想史研究？这是我国经济学发展中不能再忽视和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振兴和重大创新提供了历史机遇。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首先讨论中国经济学为什么要自主创新，然后论述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最后则扼要讨论贾根良所提出的“新经



济思想史”研究的设想。当然，这些论述只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属于一家之言，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和指正。

中国经济学为什么要自主创新

让我们先从本丛书第一本著作所研究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谈起，这是一种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运动，英文原名为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在英文中，“autistic”是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具有“自封闭的”、“幻想的”或“虚构的”的含义，法国学生在 2000 年发起这个运动时，使用这个术语指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自封闭的经济学”，对西方国家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但是，与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学学生的这种造反运动相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却兴起了一股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潮流。如果阅读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相关文献，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教条主义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种教条主义的本质都在于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要求将这一范式的学术主张和实践上升为整个学科必须遵奉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规范，并将其贯彻到经济学学科的教学、科研、人才选拔等各个方面，从而使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体制上锁定整个学科。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出的问题加以深思和考察，而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如果在没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和危机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没有考虑到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类型的情况下，固执地按照已经接受的新古典范式继续大规模地推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全盘西方主流经济学化”，无疑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我们知道，经济学



家们非常信奉以反思或省察为第一要义的理性概念，据说最近又开始了对信念和认知模式的前沿性研究。但是，他们实在应该首先研究一下自己的理性、信念和认知模式，而经济学家们的理性、信念和认知模式基本上是由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世界观所构成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简要考察。

经济学家们很难否认哲学基础对经济学范式的决定性影响，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作为现代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先驱也是得到公认的。然而，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来说，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曾写过一段著名的话，“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Georgescu-Roegen, N., 1971）。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仍坚持以机械还原论为基础的理性个人主义—均衡世界观，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陈旧的世界观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生活上越来越显示出其严重的缺陷。

正是因为建立在上述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视为普适的、甚至唯一的科学方法，从而建立起由此所支配的单一学术规范。但是，通过对其科学哲学基础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系统的假定还是内部相容性的标准上，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都因为其自身的缺陷而无法保证数学方法的现实相关性。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经济学日益远离现实，也远离科学，因为科学不能脱离对现实的关注。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取决于数学形式化的观点，支持经济学改革运动的法国经济学家们指出，将科学与使用数学联系起来是幼稚的和荒谬的，将关于经济学科学地位的争论局限在使用数学与否这个问题上是一种欺骗（爱德华·富布鲁克，2004）。

因此，长期以来，虽然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



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数学形式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制度化，它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不能根除的痼疾。霍奇逊在《20 世纪的经济学：失去机会的世纪》中谈到这种状况时，曾经非常悲观地指出，形式主义的做法，既不需要经济学史的知识，甚至也不需要了解现实经济的历史。形式主义不断成长并自我强化，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如果经济学还没有死亡，也是正在死去。经济学不管是在苟延残喘，还是已病入膏肓，在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框架之内，其复原的希望极为渺茫（霍奇逊，1999）。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首先，虽然西方异端经济学各种研究传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其直觉意识却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的世界观相契合，它对实在性质的认识也免除了数学形式主义的科学主义思维。然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强烈的门户之见，往往高估自身而贬低别派，甚至也存在对本流派思想传统的教条主义，如后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保罗·戴维森就宣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是对新古典理论唯一真正的替代。其次，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对经济问题的浓厚兴趣正在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商学院、社会学系等其他院系或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许多学者正在从事以现实为导向、面向公众的经济学研究，其优秀研究成果主要见诸于商学院、技术政策、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之类的出版物，或者通过出书来发表，鲜见于权威经济学期刊（霍奇逊，1999）。但是，这些在经济院系之外所从事的经济问题研究往往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承认为正式的经济学研究。

然而，上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都是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广泛涌动的演化科学新范式这种潜在潮流的组成部分。演化的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诸学科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却锁定在传统的经济学范式而不能自拔。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旧范式的发



展上落后于西方并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因为经济学思想史的观察证实了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和竞争激烈的地区，一种新型的经济学最有可能在原有经济学范式还没有锁定的、处于半边缘的外围地区通过“间断平衡”的方式得到更彻底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重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覆辙，并从西方异端经济学中吸收有用成果但又避免其门户之见，同时把西方社会科学界在经济院系之外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纳入到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体系之中，这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并非只是来自于对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大趋势的观察，它更主要的是起源于中国问题意识。目前，有关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仍是相当不发达的，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在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对此做出重要贡献。虽然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正如我国近几年所遭遇的许多严重的困境所警示的，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将来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功，而我们目前对过去成功的原因仍缺乏更深入的理解。我国目前所遭遇的许多严重困境说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外资和外需、对民族产业和广大劳动者缺乏有效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无法再继续下去了，特别是在面临新技术经济范式革命的挑战下，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如何仍是悬而未决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来说，“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目前的西方异端经济学也不足以应付这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别无他路，只能以中国问题为核心进行独立自主的理论创新，实现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主要目标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核心，大力发展演化科学的新范式。在这种情况下，尖锐的问题意识是必须



时刻牢记在心的。然而，能否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特殊而具体但却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命题，并通过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创造性之发展谋求强有力的解答，则取决于中国学者经由各种途径潜移默化所获得的深邃的支援意识。所谓支援意识就是米切尔·波拉尼所说的从科学传统或文化传统中所传承的“意会性知识”。那么，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需要哪些类型的支援意识呢？首先，作为欠发达国家，由于它面临着与发达经济相当不同的某些重要理论命题，因此，有关从欠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的历史性转变的当代与历史经验及其理论概括的支援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其次，由于演化新范式在经济学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某种程度上都落后于现代自然科学，因此，从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中吸收广泛的营养自然就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最后，演化科学的新范式不仅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有其丰富的先驱思想，而且 also 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某种惊人的类似性（贾根良，2004），因此，如何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对来自思想史的支援意识进行创造性转化也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一项基本的理论工作。

按照上述支援意识的思路，经济思想史研究无疑可以为经济学创新提供重要的灵感来源，特别是在演化科学新范式在经济学中方兴未艾的今天更是如此。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学科在发生危机并酝酿范式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本学科的历史进行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著名物理学家彭加勒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曾写到，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同样，不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也就不知从何创新。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说得好：“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霍奇逊，2008）。那么，就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而言，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首先，它有助于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摧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经济学多元主义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核心纲领之一，它倡导在经济学内部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实现不同的方法、理论和范式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竞争，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所谓经济学多元主义，用尤斯凯利·梅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与多个理论”（尤斯凯利·梅基，2005）：虽然客观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却是由无数个事物、复杂的演化过程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所构成，因此，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会呈现出千姿百态，观察者对它的解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可错性和不完备性。按照经济学多元主义的这种观点，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过于简单和静态的研究范式存在严重缺陷，但它仍不失为研究现实世界的一种方法，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并不否认它的价值，而是要致力于发展更为复杂的和动态的演化科学新范式。

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为这种多元主义思维提供宽广的视野。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学内部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即使在同一种研究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而且，主流与非主流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国或某个历史时期的异端学说在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历史时期很可能就成了主流学说。例如，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更多地支配着英国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德国历史学派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以及美国老制度学派在 20 世纪初曾经分别是德国和美国的主流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在美欧国家的确立也只是在二战后才发生的事情，但它仍一直遭到众多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的反对。

由于无视经济思想史的上述基本事实，我国经济学界曾一度流行过“只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异的，即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甚至有位所谓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与非主



流经济学的理论依据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而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即现代的德布鲁的均衡理论，它的基础非常坚实，现在发展不出另外一套逻辑来替代它，只能是在这一套逻辑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和发展（贾根良，2006）。这些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也取消了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性。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的状况，经济思想史研究不得不承担起解放思想的基础性功能。

其次，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华勒斯坦等，1997），我们认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化思想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中是最丰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为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做出三种最基本的贡献：为其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为其理论创新的成败提供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其目前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and 灵感来源，使其建立在坚实的思想史基础之上。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虽然演化经济学的先驱思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经济学，并包括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等，但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却是达尔文革命的产物。凡勃伦深受达尔文革命的影响，在 1898 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中不仅创造了“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且也提出了一种试图把经济学转变为一种演化社会科学的雄心勃勃的研究纲领。在 19 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演化思想在经济学界是非常流行的，以至于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马歇尔，1997）。但是，由于演化主义在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坠入了发展的“黑暗时代”，受其影响，经济学中的演化范式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已不再受到欢迎。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越来越获得其支配地位，经济学的演化范式更是陷入沉寂状态。只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复兴。目前，演化概念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流行的术语，以至于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经济理论都声称属于经济学的演化范式。

然而，按照开放系统的现代宇宙观和社会科学的特定性质，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经济理论并不能归入演化经济学，它们与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演化科学新范式的早期尝试及其先驱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是洞悉经济学特别是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途径。例如，由于凡勃伦为社会—经济体系的演化提供了一个最早、也最深奥的达尔文式的解释，因此，霍奇逊指出，为了重构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科学上的重复发现，我们在时间上将不得不做出大跨度的回溯，重访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演化争论，重访皮尔斯、詹姆斯、凡勃伦和康芒斯的智力世界，并将发现，我们想要说的大部分在从前已经被谈过了（霍奇逊，2005）。

由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存在着大量的和丰富的演化思想，因此，对于演化科学新范式的未来发展来说，回访西方经济思想史就成为一名基础性的理论工作。以霍奇逊最近出版的两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即 2001 年的《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和 2004 年的《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为例，我们可以总结这种工作对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所具有的以下三种基本的建设性作用。

第一，正如霍奇逊在 2004 年著作的序言中指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要从过去重新获得建设某些新东西的材料”。例如，有关能动性和结构的关系问题目前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仍是一个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而霍奇逊认为，这其中某些未解决问题的答案看来主要蕴含在美国（基本上是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些文献中，对这些文献进行重新探讨能够



获得宝贵的智力启迪和指导作用，这可能就是霍奇逊为什么要对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进行专门研究的动机。

第二，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为演化范式的新发展少走弯路提供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例如，霍奇逊通过对美国制度主义思想史进行研究，揭示了美国老制度学派在后期发展中为什么会偏离并失去在其开端所具有的达尔文式视野，这种教训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和吸收。

第三，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发现演化科学新范式目前的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例如，情境与脉络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历史特定性问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开始被重视，而这个问题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被卡尔·马克思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所认识，并一度在以后近百年时间里成为理论的中心问题，霍奇逊 2001 年的著作无疑将推动演化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从其思想史研究中汲取许多教益。

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最后一个但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探求目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当处于穷国地位时，它们采取了哪些政策工具、制度措施和“发展战略”来达到致富目标？作为这些政策工具、制度措施和“发展战略”之基础的经济学说是如何进行论述的？在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它们是否仍然有效？通过这种研究，经济思想史可以直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借鉴。在这方面，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和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研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新思路。

特别是以赖纳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经济思想史中就存在着一种通过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主义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延续到现代的“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



学”（赖纳特、贾根良，2007），这是一种把生产、知识、创新、协同、报酬递增和由此所引致的制度变迁看作是经济发展核心机制的经济学，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之所以相继崛起，就是因为当它们处于穷国地位时就接受了这种“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现在，它仍可以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历史经验借鉴，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提供重要的思想来源，从而构成了我们所谓“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步设想

既然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如何从事这种研究呢？我们认为，按照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两个主要目标，我们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面临着两项新的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根据现代宇宙观从哲学基础上重新思考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体系结构及其演进，对经济演化思想史进行整理并做出新的阐述。这只有在哲学基础上深刻地领悟现代宇宙观的精髓及其在演化社会科学新范式上的具体体现，才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一般说来，与牛顿主义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静态的、原子论的、封闭的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现代宇宙观则是以达尔文主义的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动态的、有机的、开放的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根本无法满足这种“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需要，因此，“新经济思想史”本身就必须造就一批在哲学基础上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哲学的最新进展上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

但是，经济思想史本身在与现代宇宙观之间的关系上绝非处于被动地位，研读经济思想史对于理解现代宇宙观在演化社会科学新范式上的具体体现具有能动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经典（自然）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现代宇宙观是在 19 世纪下



半叶的生物学革命和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大革命中诞生的，20 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新的宇宙观。但是，如果具备了现代宇宙观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们会发现，现代演化经济学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诸多先驱在其直觉意识上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宇宙观具有一致性，其理论工作具有朴素的现代宇宙观的要素，甚至我们可以说，它们具有现代宇宙观的某些先驱思想。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当我们按照演化科学的新范式重新确定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时，就必须重写经济思想史。例如，随着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被一些经济学家所接受，他们就带着一种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了经济思想史，1998 年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对经济思想史中的复杂性理论的专门讨论及其出版的著作（David Colander, ed., 2000）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按照复杂性理论的透镜来透视，经济思想史中原先地位很高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的地位就大幅度地下降了，而那些受到轻视甚至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学者如巴贝奇等就迅速地默默无闻上升为显赫的地位。该书主编科兰德还指出，在经济思想史中，有关复杂性的观点最有趣的故事与异端经济学家们有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某种接近复杂观的思想。实际上，科兰德在这里所说的异端经济学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说的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但相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丰富的演化思想而言，按照复杂性理论对经济思想史进行观察至多只能得到非常局部的认识。

然而，如果按照现代宇宙观重新观察西方经济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两种相当不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种是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甚至马克思经济学等一直到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而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前一种传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眼中被看作是异端并遭到贬斥，而后一种



则被视为正统并得到推崇。然而，如果从“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作是异端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才代表着经济学的未来。因此，“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按照这种革命性的思想重新梳理经济思想史，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提供思想来源。例如，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中，经济学的这两大研究传统同时并存，但现有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严重地忽视、甚至完全没有讨论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演化思想，所以，按照经济学的两大研究传统重新思考并进一步阐释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我们就能够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上面讨论的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项工作。那么，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给它提出的第二项研究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来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并提出特殊而具体的理论命题提供支援意识。因此，“新经济思想史”提出的第二项工作就是要以中国问题意识为核心，对目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如何成功地解决从欠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的历史性转变的相关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对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成功地解决类似于我国目前所面临挑战的相关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结合信息通讯技术革命、中国国情和目前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历史上的这些经济思想目前在多大程度上仍是有效的进行研究；研究这些经济思想是否需要扬弃或者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经济思想史学科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重要的支援意识。

为了达到这种目标，经济思想史研究所包括的范围就必须扩大，除了对比较成系统的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外，还必须结合经济史和“经济政策史”，对“经济政策思想史”进行研究。虽然经济史和“经济政策史”并不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人们并没有理由把以其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思想史”排除在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范围之外。然而，目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偏重于成系统的经济学说史，重点放在了以特定的假定为基础的抽象的经济理论上，轻视那些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抽象程度较低的、有时可能不被视作经济理论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忽视那些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实际影响但却不成系统的、甚至还有待于我们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但是，当落后国家在对发达国家进行追赶的过程中遇到非常棘手的重大问题，并试图从发达国家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的解决办法中寻求借鉴时，特别需要的却是目前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所忽视或根本就不存在的后两类研究。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就构成了“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仅以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1944）为例来说明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卡尔·波兰尼的这本著作以西欧经济为主分析了从18世纪市场受到严重管制的社会经济状态如何转变为19世纪“没有控制的”市场经济，然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如何再转变为对市场经济进行限制并实施国家干预的过程，并把后一种转变命名为“大转变”。卡尔·波兰尼以19世纪到20世纪四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史为基础，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十足的乌托邦，它自身具有一种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的倾向，因此，社会必然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从自我调节市场体系诞生之日起，社会保护就必然成为其伴随物。“19世纪的社会史，是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在全球到处延伸扩张，所涉及的商品之数量增长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在同时却出现了一个旨在对抗市场经济有害作用的深层次运动。卡尔·波兰尼指出，社会保护自身以躲避自我调节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危险，是这一时代历史中最具包容性的特征。

但是，尽管自由市场和社会保护是相伴而生的，然而，这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却呈现为一种周期性的长期运动：如果自由放